

「金智英」為什麼裂開？——厭女的天羅地網

採訪、撰文 / 李佩宸

受困於厭女結構的「金智英們」

隨著韓國電影「82年生的金智英」上映，這個引起韓國民眾論戰的題材也開始獲得國外觀眾的反響。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由韓國作家趙南柱的同名小說改編為電影，原著小說於2016年發表時，就已在韓國社會引起不小的紛爭。



資料來源：原著小說；만음사·롯데엔터테인먼트

故事主人翁是一位出生於1982年的韓國女性——金智英，她的人生經歷「平凡無奇」，不僅姓名是韓國八〇年代最常出現的菜市場名，人生不同階段遭遇過的「性騷擾」、「職場歧視」、「家庭照顧責任」等問題，也是多數韓國女性正在面對的。作者運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佐證，刻畫出「生而為女性」困頓之處，稱作1980年代的女性群像也不為過。有不少讀者或觀影者表示，她們似乎看見了「人生中某個時刻的自己」。

但也有另一群人對於作品背後存在的女權主義思維感到不滿，透露韓國社會「厭女結構」的顯題化。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姜貞吟接受採訪時表示，「厭女」是日常中的一種意識狀態，伴隨著「愛女」的意識，以兩面機制來制約及二分女性為「好女人」、「壞女人」，設下獎勵及懲戒機制，迫使女性往「好女人」——父權社會所期待的女性樣貌——規範靠攏。而在不同的情境、場合中，會出現「好女孩」、「好媽媽」、「好媳婦」、「好婆婆」……等面貌，並被相應的身份期待限制及形塑，這些現象在台灣的父權家庭中同樣可以看見。

在故事情節中，金智英受制於這一套「厭女、愛女」的規範，無法追尋理想中的人生，放棄職涯規劃成為家庭的照顧者，並在產後罹患嚴重憂鬱症，導致人格分裂的症狀。這個設定的意欲也許是讓她能以各種情境下的受困女性發話：心疼女兒的母親、難產死亡的學姊，對厭女結構中的既有觀念發起挑戰。姜貞吟教授比喻道：「就像棋盤上的棋子開始反思，為什麼規則是這樣被制定？為什麼別人能這樣走，而我不能？」

為什麼談論厭女現象讓部分人反感？

電影上映之前，韓國最大的 Naver 電影平台上的評論區分數就出現了非常極端的性別差異，只要擁有平台帳號便可以留言的評分區（左方），男性給予的分數一度低至一點多顆星，與購票看完電影之後留下的評價分數（右方）大相逕庭。



資料來源：네이버 영화

評論區的留言也掀起性別之間的論戰甚至叫囂，雖然並非準確的研究數據，仍可觀察到部分韓國人對於性別議題的敏感神經被觸動了。

不僅電影本身被檢討，演員鄭有美也因出演金智英一角遭到韓國網民鋪天蓋地的批評；南韓女團 Red Velvet 隊長 Irene 則僅是表示自己讀了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此書，就遭到粉絲抨擊，甚至出現破壞、燒毀 Irene 照片的行為，只因他們覺得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是女權主義者的「聖經」、Irene 是在提倡女權主義。

我們可以從中得知，在韓國談論女權主義和厭女現象帶有負面意涵，甚至是得以群起攻之的行為。原因在於女性意識崛起的過程中，社會深層的父權結構被動搖，既得利益者認為權力在性別平等的實踐之中被奪走，導致父權秩序失去控制權。引用《這是厭女，也是愛女》第一章^[註 1]的內容可略知一二：「厭女則是一種甚具規範強制性的道德教條，就像『父權秩序的執法者』，扮演維持治安和執行秩序的角色，若有試圖挑戰和破壞父權秩序的行動，就會成為被糾舉出來獵殺的對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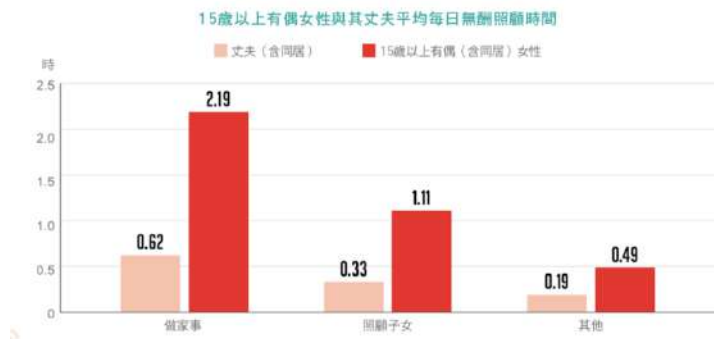
隱性壓迫「金智英們」的臺灣社會

厭女出現的樣貌不僅只韓國社會的獵巫式批判，更多時候是幽微環繞在女性的家庭生活、社會關係之中，臺灣社會在性別議題的討論雖然較韓國溫和、理性許多，但日常許多時刻仍然面對著厭女困境。姜貞吟教授舉台灣的父權家庭為例，許多中生代女性雖然更有機會提升性別意識，卻因整個結構並沒有給予她們空間改變、逃脫，因而被迫妥協於厭女的種種規範，直至今日仍然沒有在家庭關係中獲得解方。

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9 性別圖像

參考 2019 年發布的性別圖像，我國在性別不平等指數（GII）為 0.056，是亞洲最平等的國家，於 161 個國家中排名第八。

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9 性別圖像

但在家庭照顧的部分仍然有相當大的性別差異，15 歲以上的有偶女性做家事和照顧子女的時間超過丈夫 3 倍以上，對照電影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中女性獨自一人在廚房、家庭中忙碌的畫面，台灣似乎也有同樣的一群身影正被困住。

除了離婚一途，這就是我的命運

陳淑芬（化名）出生於民國 59 年，生長於閩南家庭，學生時代成績優異，聯考時考上了中山女高，卻因家中經商失利，最終進入有獎學金補貼的師專就讀，這是她作為女兒的妥協。後來在職場結識同為小學教師的先生，進入了客家家庭，從零開始學習客語及客家文化。她雖然認知到自己在這個傳統家庭中有許多限制，卻仍抱著被接納的希望。

但在超過二十年的婚姻當中，陳淑芬沒有一刻感受到這個家庭曾對她張開雙臂。在和公公的相處中，陳淑芬再次體會到母親曾經施予她的制約：「我的母親和公公幾乎是一樣刻薄的人，就算一年只出去玩了一天，他們都覺得我變壞了，因為我沒有在家幫忙處理那些，永遠都做不完的事。」

陳淑芬和其他夫家成員的相處也稱不上理想，因丈夫是獨子，照顧二老的責任便落在了兩夫妻身上。前二十年和四個小姑尚且相安無事，直到婆婆過世以後，姑嫂衝突才開始浮現。當時公公患上失智症，開始有了多疑、猜忌的症狀，對陳淑芬夫妻全然不信任，在一次爭執時，陳淑芬被失控的公公打傷、趕出家門。

但此事之後，小姑們聽信了公公的說法，反過來指責陳淑芬未盡媳婦孝道，這些年的看顧只是想繼承家產，陳淑芬才真正對夫家成員灰心：「我後來才明白過去她們只是「必須」跟我相處，而以前的我什麼都可以配合，所以不會出現衝突。當我可能會反抗並且危及她們的生活的時候，那我就是仇人。」雖然情感面難免失望，陳淑芬其實明白小姑們也面對著相同處境：她們有自己的婆家、兒女要照顧，所有人都只不過是在父權秩序下行動。

做為媳婦角色，她能同理小姑們，作為女兒角色，其實也沒有任何不同：「當我打算要從照顧者的角色抽手的時候，她們就必須接手，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我以前認為他們非常孝順，但是那其實是很深的害怕，就像我同樣害怕自己是不孝的女兒。當父母過得不順的時候，女兒們的生活也會不斷地被打擾，成為父母傾訴的對象和情緒垃圾桶。」

姜貞吟教授對於陳淑芬的遭遇並不感到太驚訝，因為臺灣典型的父權家庭就是這樣持續厭惡、壓迫女性成員的。教授也不否認陳淑芬所認為的「命運」，似乎是如今多數中生代女性必須妥協的生活狀態，因為上一代幾乎不曾接收性別平等、尊重個體的教育，父權思維所建立的秩序實在很難短時間根除。

看似都明白，卻又不為人知的故事^[註 2]

在面對「金智英」或是「陳淑芬」們時，除了提出現象以外，似乎無法更進一步的鬆動厭女結構或是父權秩序。但姜貞吟教授認為，意識到「現象本身」就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因為現象背後可能就是一種結構，而結構有一個相應的文化心理狀態，這種心理狀態很難被察覺跟感受到。

現在的知識界已經可以把結構論述得十分完整，但是心理層面仍然很難爬梳，結構下的個體也就難以獲得改變和喘息的空間；也因為台灣的現代化社會還太年輕，必須要等待漫長的社會質變，才能真正從根本翻轉固有的價值體系。

本報導期待能為讀者未來的生活提供一對眼睛，去看見「金智英」或是「陳淑芬」們生命中的那些破碎，試圖理解她們在厭女羅網之中的掙扎與努力，因為那些都是我們身邊存在著的「看似都知道，卻又不為人知的故事」。

註解：

[註 1] 王曉丹主編。《這是厭女，也是愛女》p.46。大家出版

[註 2] 改寫自電影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預告片